

# 环太湖地区史前时期头向传统的区域差异及演变 ——兼谈良渚古城崛起的背景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Head Direction Tradition in Taihu Neighborhood  
Prehistoric Tombs and Concurrently Discussion on Background of Liangzhu Old City's Rise

陈明辉

Chen Minghui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 310014)

(Zheji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angzhou, 310014)

**内容提要:** 基于陶器组合的研究可知马家浜时期环太湖地区太湖西部、太湖北部和太湖南部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这种差异在崧泽至良渚时期逐渐减弱, 反映了这一区域日渐加强的文化同化和融合, 这一过程在墓葬头向传统的区域差异及演变上也有所显示。良渚古城区的丧葬传统及玉器随葬和部分陶器等与苕溪下游乃至巢湖流域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根据墓葬头向的研究, 在整个环太湖良渚时期墓葬普遍以南向为主导之时, 良渚古城区仍存在两种采用不同头向传统的人群。

**关键词:** 环太湖 史前时期 头向传统 文化演变 社会变迁

**Abstract:** There i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in pottery combinations among western Taihu, northern Taihu and Southern Taihu during Majiabang period. This difference gradually declines from Songze to Liangzhu period, indicating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fusion. This trend also appears in the tombs' heads direction tradition in this region. In Liangzhu old city, funeral custom, jade and funeral goods and some potteries are most related to lower Tunxi and Chaohu waters. Based on research of head directions in tombs, though south is the dominant style in the whole Taihu during Liangzhu period, ancient residents in Liangzhu old city use two different head directions in funeral custom.

**Key Words:** Taihu neighborhood; prehistorical period; head direction tradition; cultural change; society change

墓葬头向是葬制葬俗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基于墓葬的社会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同向墓与异向墓在墓地、区域和文化区内的分布规律是探

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的一把钥匙。王仁湘先生曾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近9000座墓葬的墓向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 对头向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

梳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观点。其中,关于环太湖地区墓葬头向,他认为马家浜文化的主向是比较统一的北向,崧泽文化逐渐转为东、东南以至南向,良渚文化主向则为南向<sup>[1]</sup>。从该文发表至今,环太湖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资料又有了极大的丰富,为我们探讨这一地区头向传统的区域性差异和历时性变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酸性土壤的侵蚀,环太湖地区墓葬中的人骨保存一般都较差,绝大多数墓葬中墓主人骨仅残留少量牙齿、骨骼朽痕或骨渣等,难以判断墓主头向。部分人骨保存较好或保存有牙齿的墓葬可直接判断墓主头向,部分人骨全无的墓葬有时候可根据随葬的玉器、陶器的位置判断墓葬的头向。

## 一、马家浜时期

马家浜早期阶段炊器以釜为主,代表性文化有太湖西北部的以平底釜为炊器的骆驼墩文化和太湖东南部以圜底釜为炊器的罗家角文化。骆驼墩文化已发现数处遗址,包括骆驼墩、神墩、西溪、秦堂山等。相关证据已显示,马家浜早期阶段骆驼墩文化是环太湖的文化高地,祁头山文化、邱城一期、吴家埠一期均是在骆驼墩文化的传播影响下形成的。不过,目前为止并未发现马家浜早期阶段的土坑墓,甚至骆驼墩文化的源头双墩文化中也未发现土坑墓,因此无法探讨其头向问题。

马家浜晚期阶段墓葬材料见于太湖西部属薛城文化的神墩、骆驼墩等遗址,太湖北部属祁头山文化的祁头山墓地;太湖北部及东部属圩墩文化的东山村、新岗等墓地;太湖东南部属马家浜文化的马家浜、吴家浜等遗址;太湖西南部的长兴江家山墓地。另外还有宁绍地区的塔山墓地(或被称为塔山下层文化)、宁镇地区属北阴阳营文化的北阴阳营墓地、江淮东部属龙虬庄文化的龙虬庄墓地、皖江西部及鄂东的属黄鳝嘴文化的黄鳝嘴墓地与塞墩墓地,年代与此相当,并与环太湖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在此可一并讨论。

### 1. 太湖西部的东向传统

太湖西部属薛城文化。已发现多处墓地,人骨基本保存完整,墓葬头向清晰。神墩墓地材料已全面披露,为一处较为完整的公共墓地,墓地层位关系相同,陶器组合及特征近似,年代总体接近,属马家浜晚期早段,距今约6400—6300年。大多数墓葬都可辨识人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所有墓葬头向均向东或东略偏北、偏南,表现出极强的趋同性”<sup>[2]</sup>。骆驼墩、薛城和三星村的墓葬材料也有少量介绍。骆驼墩发表了墓葬总平面图,除个别头向北或西偏北外,均朝向东偏南<sup>[3]</sup>。三星村墓地已清理墓葬1001座,分布非常密集,“头向多朝向东北,极少例外”“大多数墓随葬夹砂陶鼎1件,置于头顶部”,墓葬头向和葬俗与神墩一致<sup>[4]</sup>。新近发掘的秦堂山遗址清理出一片马家浜晚期墓地。据发掘者甘恢元介绍,头向朝东。不过,同属薛城文化的薛城遗址清理这一时期墓葬115座,“墓葬头向仅一例为东南向,一例东向,其余皆东北向”<sup>[5]</sup>,可能是因地理上距北阴阳营文化较近而受到其强烈影响所致。

同时期属太湖北部的祁头山墓地(或称为祁头山文化,是骆驼墩文化的地方变体)也为东向传统,清理墓葬132座,共发现9层相互叠压的墓葬<sup>[6]</sup>,年代约距今6400—6200年,人骨保存都较差。根据部分有人骨保存的墓葬可知头均向东,有将釜尤其是豆打碎覆盖头部的现象,可推知大部分墓葬均为头向东或东偏北,与太湖西部一致,但将随葬釜、豆等打碎覆盖墓主头部的现象在太湖西部中不见,器物组合也有较大差异,显示出较明显的地域特征。随后祁头山墓地及祁头山文化未在当地延续,太湖北部全部被圩墩文化所占据。

### 2. 太湖北东部及太湖东南部的北向传统

太湖北东部的马家浜晚期阶段遗存以圩墩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为代表。墓葬头向上,该地区是以北向或北偏东为主向,葬式方面盛行俯身葬,且这种北向传统在太湖北部(以东山村、新岗为代表)一直延续到崧泽晚期,到良渚时期才转为南向。

太湖北部靠近长江的圩墩、东山村和新岗等遗址均发掘了从马家浜晚期到崧泽早期至晚期的墓葬资料。圩墩遗址总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1972年、1974年和1978—1979年进行了五次发掘<sup>[7]</sup>,共清理墓葬191座,人骨保存较好,葬式以单人俯身葬为主,头向均朝北(正北、北偏东或北偏西)。东山村墓向均为南北向,或西北—东南向,人骨大多保存不好,保存好的均头朝北<sup>[8]</sup>。新岗清理马家浜晚期阶段墓葬16座<sup>[9]</sup>,墓向均南北向,多数墓葬保存有人骨,头向北偏西或北偏东。

太湖东部沿岸的墓葬头向也是头朝北。邱承墩清理马家浜晚期墓葬12座<sup>[10]</sup>,其中M12、M13、M16、M17、M18、M19可辨头向,均朝北。绰墩清理马家浜晚期墓葬38座<sup>[11]</sup>,人骨保存较好,均南北向,仅1座墓葬墓向朝南,其余均朝北。草鞋山发现马家浜晚期墓葬106座<sup>[12]</sup>,在能判明方向的94座墓葬中,北向的86座、西向5座、东向3座,俯身葬盛行。彭祖墩清理马家浜晚期墓葬15座<sup>[13]</sup>,资料发表有限,根据总图及少量文字介绍可知,可辨头向者基本都头朝北偏东。

太湖东南部的马家浜、吴家浜、广福村马家浜晚期阶段的墓葬头向也朝北。广福村清理马家浜晚期墓葬20座<sup>[14]</sup>,以俯身直肢葬为主,头均向北。越城遗址清理马家浜墓葬3座<sup>[15]</sup>,2座可辨头向,朝北,而另外7座崧泽晚期至良渚时期的墓葬,则根据随葬品位置可判断头向大致朝南。

此外太湖西南部的安乐、芝里等遗址发表了少量马家浜晚期的墓葬资料,人骨基本无存,根据随葬器物可知马家浜末期至崧泽早期似乎比较流行头向朝北,而到了崧泽晚期则转而流行朝南<sup>[16]</sup>。吴家埠第四文化层清理墓葬8座,属马家浜时期,“葬式都是单人俯身直肢葬,头向北或略偏东”<sup>[17]</sup>,无论葬式还是头向均与太湖北部和太湖西南部相近。

### 3. 太湖西南岸的南向传统

根据简报,长兴江家山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340座,其中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46座、崧泽文化墓葬292座及良渚文化墓葬2座”。292座崧泽文化墓葬

中,“以早期墓葬数量为多”。T33—34 ④—⑥层属崧泽文化,⑦—⑩层属马家浜文化<sup>[18]</sup>。简报公布了一批“崧泽早期”29座墓葬,集中分布于崧泽基地的东端,均开口④层下,人骨保存较好,墓葬中以无随葬品的墓葬为多,男性随葬石镞、女性随葬纺轮,部分墓葬随葬的明器化扁折腹小罐,这些特征均与神墩马家浜晚期墓地接近,年代可能早至马家浜晚期阶段。但这批墓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头向基本朝南。

### 4. 宁镇地区与皖江西部的北向传统

宁镇地区马家浜晚期阶段的遗存是北阴阳营文化,其中北阴阳营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并发表报告。皖江西部马家浜晚期阶段分布着黄鳝嘴文化,其中塞墩墓地资料已得到完整披露,黄鳝嘴遗址也有少量墓葬。

北阴阳营发掘马家浜晚期至崧泽早期墓葬258座、崧泽晚期墓葬13座<sup>[19]</sup>,绝大部分墓葬东北—西南向,人骨保存较好,可知头向北或北偏东,仅少数墓葬头向南或向东、向西。

塞墩清理黄鳝嘴文化墓葬60座,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二次葬,头向基本都为北偏东方向<sup>[20]</sup>,与北阴阳营文化和圩墩文化一致。这种头向传统被后来的薛家岗文化继承下来。塞墩发掘的108座的薛家岗文化墓葬,主体年代相当于崧泽早期,单人仰身直肢二次葬最普遍,头向基本为北偏东。武穴鼓山发掘的238座墓葬中,南北向者22座、东西向者16座,头朝北的墓葬共205座<sup>[21]</sup>。黄鳝嘴清理黄鳝嘴文化墓葬17座,墓坑未找出,人骨也没有保存下来,随葬品“放置方向大多数呈东北—西南向,个别为东南—西北向”,可能与塞墩一致。

### 5. 江淮东部与宁绍地区、金衢盆地的东向传统

江淮东部马家浜晚期分布有龙虬庄文化,龙虬庄墓地清理墓葬402座,分属⑥层、⑤层、④层,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墓葬的头向绝大多数朝东,基本上在90°左右”<sup>[22]</sup>。龙虬庄文化之后该地区先后被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占据,海安青墩清理新石

器时代墓葬98座<sup>[23]</sup>，年代相当于崧泽时期至良渚时期，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除1座南偏西和1座乱葬坑外，均向东或东偏南。蒋庄遗址近期发掘了一处良渚时期墓地，据领队甘恢元见告，头向基本朝东。说明江淮东部地区尽管文化历经多次变化，但文化传统一直得到某种传承。

河姆渡遗址二期（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早期）清理墓葬13座，开口③B或③A层下，多无随葬品，多侧身屈肢葬，头向均朝东或东偏南；河姆渡三期（大致相当于马家浜晚期）清理墓葬3座，头向及葬俗与二期同；河姆渡四期（大致相当于崧泽时期）清理墓葬11座，头朝西或西偏北的墓葬较多，另有2座头朝东<sup>[24]</sup>。塔山<sup>[25]</sup>清理下层（相当于马家浜晚期）墓葬40座，人骨保存较好，仰身直肢为主，“头向分东、东偏南、东偏北三类”；中层（相当于崧泽时期）墓葬21座，分属两片，1990年、1993年发掘的15座墓头向主要朝东北，2007年发掘的6座墓主要朝东，可能分属两个人群；上层（相当于良渚时期）墓葬4座，3座头向北偏东，1座朝东。奉化名山后清理马家浜晚期墓葬4座，头朝东北，崧泽晚期墓葬2座，头朝东<sup>[26]</sup>。此外良渚时期的墓葬在金衢盆地及周边也有两处重要发现：阔塘山背清理良渚时期墓葬44座，人骨无存，报告推测头向朝东<sup>[27]</sup>；小青龙清理良渚时期墓葬44座，墓坑方向包括西北—东南向和东北—西南向两种，杂处于同一墓区，可能存在两类人群，人骨无存，可辨头向者仅3座，均朝东北。好川文化中的好川墓地头向也以朝东南为主<sup>[28]</sup>。以上宁绍地区和金衢盆地周边从河姆渡时期开始一直到良渚时期，头朝东（或东北、东南）的传统一直都得到较大程度的保持。

## 6. 小结

以上分析可知，马家浜晚期阶段头向传统较为复杂，但小区域内头向基本统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家浜晚期阶段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文化整合并未发生，各个小区域有着很强的独立性。笔者曾撰文指出，马家浜晚期阶段环太湖地区应划分为薛城

文化、圩墩文化和庙前文化等多个小区域文化，并不存在面貌统一的马家浜文化<sup>[29]</sup>。

东向传统分布于太湖西部，局部东扩至太湖北部（祁头山），到崧泽时期完全消失不见，这与陶器组合的变化是一致的。薛城文化、祁头山文化并没有在本地传承下来，在崧泽早期阶段太湖西部遗址极少。太湖西南岸的南向传统也并未在当地得到传承，邻近的安吉安乐、芝里等遗址崧泽早期的墓葬头向朝北，而江家山及安乐、芝里的崧泽晚期墓葬推测大部分头朝南。头向产生了三次重大变化，从某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通道的复杂性。

北向传统分布于太湖北东部，从马家浜晚期末段开始，即扩散至以安乐、芝里为代表的太湖西南部和广福村、马家浜、吴家浜为代表的太湖东南部，并在太湖北部一直延续到崧泽晚期，显示出这一文化传统较为强势，且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东山村M101这一类贵族墓葬及其继承者东山村崧泽早期贵族专用墓地的形成，显示出这一文化在马家浜晚期末段至崧泽早期是环太湖地区的中心文化（或可称文化高地）。与太湖北部一样的是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皖江西部的黄鳝嘴文化，都是北向传统，笔者在分析陶器组合和风格时也曾指出，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对圩墩文化的消失、东山村文化（东山村M101为代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起作用的还有龙虬庄文化），同时也对黄鳝嘴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30]</sup>。北阴阳营文化对环太湖地区、皖江西部地区乃至长江中游的文化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 二、崧泽时期

崧泽时期，头向差异性开始变小，墓葬基本上都为南北向（略偏东或偏西），头向存在两种传统，即北向传统和南向传统。

### 1. 太湖北部继承马家浜并延续整个崧泽时期的北向传统

代表性的遗址为东山村和新岗。东山村清理

崧泽时期墓葬37座,从崧泽早期延续至崧泽晚期,人骨大多未能保存,头向可辨的均朝北<sup>[31]</sup>。常州新岗清理崧泽文化墓葬101座<sup>[32]</sup>,从崧泽早期延续到崧泽晚期,墓葬均南北向或北偏东,人骨保存一般,头向可辨的墓葬绝大部分朝北,仅1例朝南(M104)。江阴南楼清理崧泽时期墓葬25座<sup>[33]</sup>,墓葬延续时间较长,包括崧泽早期和崧泽晚期,均单人葬。该遗址虽然距新岗、东山村不远,但其墓葬头向南,显示出特殊性。

## 2. 太湖西南部及东南部从崧泽早期的北向转为崧泽晚期的南向

太湖西南部,上文已经指出,江家山墓地马家浜晚期墓葬头多朝南。此区崧泽早期的墓葬在安乐有少量发现,大多数墓葬头向不明,似以头朝北为主,如安乐96M4、96M20、96M21,到了崧泽晚期,无论是江家山、红卫桥<sup>[34]</sup>,还是安乐、塔地<sup>[35]</sup>、昆山,可辨墓葬头向的基本上都是朝南。值得注意的是湖州昆山遗址,共清理了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的墓葬61座<sup>[36]</sup>,墓葬成排分布,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头向基本都朝南,陶器集中于脚端。从排列方式来看,同一排的墓主性别大多为同性,但都存在一两个异性,说明昆山已经开始出现有意识的男女不同排的趋势,尽管尚未像庙前、瑶山一样成为定式,但可能是后者的渊源所在<sup>[37]</sup>。昆山墓地中男女性别区分非常清楚,这一点与江家山墓地和庙前、瑶山等墓地特征也很接近,两地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人群显然有着紧密的文化往来。不过从陶器组合来看,昆山与良渚古城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昆山以凿形足粗泥陶鼎为主,鱼鳍形足少见,而庙前等则基本不见凿形足鼎,绝大多数都是鱼鳍形足鼎。

太湖东部及东南部的崧泽早期遗址发现极少,分布密度远远不如太湖北部,属崧泽文化边缘区。目前仅南河浜和仙坛庙遗址两处遗址明确有崧泽早期遗存,墓葬头向多朝北,到了崧泽晚期遗址数量大为增加,这一时期墓葬头向得到统一,基本都朝南。嘉兴南河浜清理崧泽时期墓葬92座<sup>[38]</sup>,良渚时期墓葬4座。B区的7座墓葬属崧泽早期,头向均朝北。崧泽时期大

部分墓葬头朝南,少部分墓葬头朝北。A区墓葬基本都是属崧泽晚期,头向转为向南,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海盐仙坛庙墓地主体属崧泽早期至良渚晚期,墓葬166座<sup>[39]</sup>,人骨保存较好。崧泽早期墓葬头向既有朝北也有朝南,朝北、朝南没有性别差异,到了崧泽晚期头向基本都朝南。桐乡普安桥介绍了6座崧泽晚期墓葬和1座良渚时期墓葬的资料<sup>[40]</sup>,人骨保存较好。头向均朝南,多数墓葬玉璜、石钺不共出,但M8随葬石钺和玉璜。海宁酒地上<sup>[41]</sup>、九虎庙<sup>[42]</sup>、瑞寺桥<sup>[43]</sup>、皇坟头<sup>[44]</sup>的崧泽晚期墓葬主向也都朝南。

太湖东部的青浦崧泽遗址崧泽早期和崧泽晚期的墓葬头向与南河浜一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清理崧泽时期墓葬100座,报告分三期:“一期以北向为主”,包括北偏西和北偏东;“二期大部朝南”,朝南的均为南偏东;“三期头向与二期相似”<sup>[45]</sup>。青浦福泉山清理崧泽时期墓葬19座<sup>[46]</sup>,既有崧泽早期墓,也有崧泽晚期墓,头向朝南的有16座,朝北的2座。昆山赵陵山清理崧泽晚期至良渚时期墓葬90座,土台上的70座墓葬以南北向为绝大多数<sup>[47]</sup>,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头基本朝南。绰墩遗址清理崧泽时期墓葬38座<sup>[48]</sup>,多属崧泽早期,墓葬以南北向为主,少量东西向,头向多朝南。

通过以上材料的梳理可知,崧泽早期阶段,太湖北东部的北向传统在崧泽早晚期均有较明显的延续。其实除了东山村、新岗两处墓地外,太湖东、南部的南河浜、崧泽以及太湖西南部的安乐、芝里的崧泽早期阶段墓葬头向也以朝北为主,而同时已出现了少量南向传统的墓地,如南楼、绰墩,呈现出北向和南向传统在同一文化分布区交错分布的态势,不过总体上北向为主流。但到了崧泽晚期,除了东山村、新岗两处墓地,环太湖地区的墓葬头向基本都转为南向。从江淮东部、宁绍地区到皖江西部,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头向在同一小区域内具有较强烈的统一性和传承性,头向的转变可能与文化变革和社会变迁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根据前文的归纳,在整个马家浜时期南向传统仅在太湖西南岸的长兴江家山墓地昙花一现,随即被源于太湖北部东山村社群的北向传统所取代,在

崧泽早期并不存在南向的墓葬。环顾环太湖周边，只有凌家滩墓地以南向为主向。凌家滩墓地面积达14000平方米，1987和1998年清理墓葬44座，墓葬开口层位分为四种<sup>[49]</sup>：④层下、③层下、②层下、①层下。2007年第五次发掘墓葬4座<sup>[50]</sup>。尽管大部分墓葬属崧泽晚期阶段（亦即大汶口早期三、四段<sup>[51]</sup>）无疑，部分墓葬87M13、87M17、98M16出土的鬻、长颈壶等器型与东山村崧泽早期墓葬一致，年代可早至崧泽早期阶段。尽管人骨基本未保存，但从随葬品尤其是玉器的位置推测头向基本朝南。

根据安乐、芝里、南河浜等太湖东南部和西南部相关遗址的分析可知，陶器组合和风格在崧泽早晚期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鼎。崧泽早期阶段环太湖南部鼎主要有鱼鳍形足和铲形足两种，而到了崧泽晚期，鬲形足鼎大量出现，“在崧泽晚期的前段，太湖流域主要受到来自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的影响”<sup>[52]</sup>。由此似可佐证，环太湖南部地区崧泽晚期头向朝南传统的骤然形成似乎也与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的影响有关，苕溪下游太湖西南部是最早接触这一来自西部世界影响的区域。

### 三、良渚时期

良渚时期，整个环太湖地区墓葬头向得到了基本统一，绝大多数墓葬均头朝南。如太湖北部的高城墩墓地<sup>[53]</sup>，14座墓葬头向均朝南，年代从良渚早期延续到良渚晚期，均不出纺轮和玉璜，且有多达13座墓葬出土玉钺或石钺，无法根据遗物区分墓主的性别，因此，尽管被认为与瑶山、反山关系非常密切，但在葬俗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陶器组合也完全不一样，显示高城墩与瑶山、反山有不同的文化底色。又如太湖东部福泉山清理良渚时期墓葬30座，年代从良渚早期延续至良渚晚期<sup>[54]</sup>，部分人骨保存较好，南向的墓葬26座、东西向2座、头向不清的2座<sup>[55]</sup>。马桥清理良渚文化墓葬12座<sup>[56]</sup>，单人仰身直肢，11座墓葬头向南偏东或正南，包括6座男性和4座女性，M5鉴定为女性，头向北。太湖东南部的海宁小兜里<sup>[57]</sup>、桐乡新地里<sup>[58]</sup>及嘉兴地区其他遗址<sup>[59]</sup>，以及下文将要提到

的良渚古城区，崧泽晚期以来一直到良渚晚期，墓葬头向均以南向为主向<sup>[60]</sup>。

环太湖地区以外，墓葬头向的主向明显不同，如江淮地区头朝东为主，宁绍地区及金衢盆地以朝东或东北为主。这两个区域的良渚时期遗存的陶器组合也有明显的自身特色，显示出文化分布边缘区的本地传统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维持。

王仁湘先生早已指出在一处存在主流头向的墓地中常常会有少量逆向墓，这些墓葬“在墓区有特定的埋葬位置，而且还有特殊的葬式，死者的待遇也常常与主向墓不同”<sup>[61]</sup>。良渚文化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赵陵山土台下清理了20座良渚时期的丛葬墓，头向比较随意，11座朝北，7座朝南，明显与其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有关，部分墓葬有明显的非正常死亡迹象<sup>[62]</sup>。又如庄桥坟，271座良渚时期墓葬中“大部分墓葬的墓向为南北向，发现22座东西墓……头向东或西，随葬品只有一两件或没有”，“身份或地位有别于其他的墓葬”<sup>[63]</sup>。

笔者特别关注了在良渚古城区存在的两种不一样的头向传统，即男女异向和男女同向（均朝南）。

#### 1. 男女异向

卞家山墓地中墓主头向与性别之间联系的揭示，开启了良渚墓葬性别考古研究的新视角。卞家山墓地共清理墓葬66座，年代属良渚早期偏晚至晚期，存在男性墓基本头朝南、女性墓基本头朝北的现象。这一点《卞家山》发掘报告已经有了明确的介绍<sup>[64]</sup>，此不赘述。

文家山墓地<sup>[65]</sup>也存在这一性别的头向差异问题。文家山清理墓葬18座，M7为女性，M5、M14可能为女性，头均朝北；其余似乎均为男性，头均朝南。

新近发掘的姜家山（良渚早期）、黄路头（崧泽晚期至良渚晚期）<sup>[66]</sup>也如此，仅存在极少数的反例。如姜家山墓地，2015年清理了14座墓葬，除1座出土玉璜的女性墓葬头朝南外，其余女性墓葬均头朝北，男性墓葬均头朝南，而且男女在同一排中交错分布，也显示出与瑶山完全不一样的墓位排列方式。

官井头墓地中清理崧泽晚期墓葬55座、良渚早期墓葬51座,其中崧泽时期墓葬已发表了墓葬登记表和部分墓葬的相关资料,为我们进行性别考古分析创造了条件<sup>[67]</sup>。这批崧泽墓葬包括有朝南和朝北两种头向,朝南的墓葬共30座,朝北的墓葬共25座,朝南的墓中男性墓有12座、女性墓有6座,朝北的墓中女性墓有9座、男性墓有6座。也就是说,男性墓偏向于朝南,女性墓偏向于朝北,但还没有卞家山、文家山、姜家山等这些良渚时期的墓地那么规范。官井头的发掘者赵晔对比了瑶山良渚早期的M1、M4等和官井头良渚早期的M51、M54和M64,发现玉器随葬数量、种类、出土位置、配伍关系和形态都与庙前非常接近,且“官井头规格居前的7、8座墓葬也应是女性墓葬”,认为瑶山墓地最早的那批女性贵族是从官井头分流过去的<sup>[68]</sup>。可见瑶山墓地的女性贵族墓继承了官井头良渚早期女性贵族墓的玉礼器系统。但根据赵文披露,“官井头良渚早期贵族墓以及大部分平民墓的头向均朝北,而瑶山墓地的头向均朝南”,显示出二者在头向传统上的巨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石马兜<sup>[69]</sup>公布的两座崧泽早期墓葬M55、M78头向均朝北,3座崧泽晚期墓葬中有2座女性墓头朝南、1座男性墓头朝北。这一现象说明男女墓葬头向异向的现象在崧泽晚期还没有完全成形,尽管在官井头和黄路头墓地已经开始显露这种趋势,但要到卞家山、文家山才完全形成。

男女异向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佛山河宕墓地中也有发现,共清理墓葬77座,56座墓葬进行了人骨鉴定,结果显示男性头向西,女性头向东<sup>[70]</sup>。

## 2. 男女同向

同样明显的是,瑶山、反山王陵中,不管男性墓还是女性墓,头向一律朝南。

瑶山发掘了13座墓葬<sup>[71]</sup>,其中M12为王墓。这些墓葬分南北两排,北排6座随葬玉璜、玉纺轮、圆牌串饰等,属女性墓;南排随葬玉钺、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等,均为男性。不管男女,头向一律朝南。

反山<sup>[72]</sup>是以墓地最早的墓葬之一M12为核心的王族墓地,年代总体略晚于瑶山M12,但随葬品总体比瑶山同级别墓葬丰富很多,是良渚古城繁盛期的代表。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可以推测正是以反山M12墓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主导兴建了莫角山、水利系统和城墙、部分外城等大型工程。反山墓地共11座墓葬,9座早期墓葬分南北两排,其中北排包括2座女性墓葬和2座男性墓葬,南排5座均为男性。不论男女,头向一律朝南。

庙前平民墓地的资料说明头向朝南不仅仅是王族墓葬的特征。庙前墓地六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8座<sup>[73]</sup>,年代延续很长,包括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和晚期。从庙前墓地的发掘清理来看,不同阶段的墓地一般集中分属不同区域,显示着墓地选址在不断变化。检索头向资料发现,绝大多数墓葬均头朝南,不论男女,这一特征与瑶山是一致的。

从墓葬的排列方式来看,瑶山与庙前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庙前良渚早一期一段墓葬可能存在南排埋设男性,北排埋设女性的习俗,这一葬俗也与瑶山墓地一致。庙前西南组崧泽晚二段墓葬实际上分别处于良渚早一期一段墓组四排墓葬的西端,肯定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能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血缘家族。如此说成立,则说明当时存在自西向东逐次埋设墓葬的葬俗,这种埋葬方式与瑶山非常相似。可见,不管是墓葬头向、排列方式还是埋葬次序,瑶山都与庙前近似,瑶山墓地继承了年代更早的庙前墓地形成的“庙前传统”。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良渚古城城内存在着具有不同头向传统但随葬陶器组合相同的两大群体。第一类包括庙前、瑶山、反山,属王族墓地和平民墓地,男女墓主同向,均朝南,起始于崧泽晚期,延续至良渚晚期,从庙前到瑶山再到反山,三者之间存在明确有传承关系的丧葬传统;第二类包括官井头、黄路头、卞家山、文家山、姜家山<sup>[74]</sup>,属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男女头向异向,目前未发现王陵墓地的代表,崧泽晚期还处于初创阶段,正式形成于良渚早期,延续至良渚晚期。

以官井头、黄路头、卞家山、文家山、姜家

山等墓地为代表的男女头向异向的丧葬习俗在整个良渚文化中独具特色,代表着一种本地的习俗及人群。以庙前、瑶山、反山为代表的男女头向同向则是良渚文化的主流葬俗。这两大群体基本同时共存,最终汇聚于瑶山墓地和良渚古城址区。

据此可推测,良渚古城区的崛起是瑶山、反山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整合了两大头向传统所代表的人群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两大人群包括以官井头、卞家山、文家山、姜家山墓地为代表的本地人群,和以庙前、瑶山、反山为代表的外来人群。从渊源来看,良渚古城区以瑶山、反山为代表的南向传统、器物组合、墓葬排列方式与分布于苕溪下游的湖州昆山崧泽晚期墓地最为接近,显示了二者紧密的亲缘关系,这一点从陶器传统上也能看出端倪,最典型的即两地均共出大量圈足盘。而这一影响的更远的源头,则是年代属崧泽时期的凌家滩墓地。

已有多位学者从随葬玉器和聚落变迁角度指出,良渚古城区崛起有着明显的西苕溪乃至巢湖背景<sup>[75]</sup>。庙前的发掘及本文的研究则说明,来自西部的影响早在崧泽晚期阶段就已经存在,只是到了瑶山、反山为代表的良渚早期外部影响才占据了主导地位。

## 四、结语

基于陶器组合的研究是分辨考古学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往往可以作为推测人群迁徙和区域互动的重要手段。以墓葬头向为代表的葬俗研究是社会考古学的重要内容。本文对环太湖地区史前时期头向传统的区域差异和陶器组合的研究,都可证实从马家浜时期、崧泽时期到良渚时期,有一个区域差异逐渐减少、面貌逐渐统一的过程,反映日渐加强的文化融合、社会整合甚至政治统一。

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中心存在过三次主要的变化:马家浜早期阶段位于太湖西部,以骆驼墩文化为中心,而马家浜末期开始,逐渐转移至太湖北部和东部,形成以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的强势文化,进入分化社会阶层社会的发展阶段,其影响在马家浜末期至崧泽早期几乎遍及整个环太湖地区;从崧泽晚期开始,巢湖流域、皖江地区的文化因素通过太湖西南通道持续影响太湖南部地区,开始形成与太湖北部相抗衡的力量;到了良渚早期,原本地处文化边缘地区的良渚古城区崛起,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 注释

- [1] 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 [2] 南京博物馆、常州博物馆、溧阳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溧阳神墩》,文物出版社,2016年。
- [3]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苏宜兴市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7期;南京博物院、宜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 [4] 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5] 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高淳县文管所:《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
- [6] 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博物馆:《祁头山》,文物出版社,2007年。
- [7] 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第4期;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常州博物馆:《常州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等:《“环太湖西北部马家浜时期古文化研讨会”发言摘要》,《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29日第7版。
- [8] 张照根、姚瑶:《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苏州博物馆、张家港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0期;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 [9] 常州博物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常州新岗》,文物出版社,2012年。
- [10]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1]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2] 南京博物馆:《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汪遵国:《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文物出版社,1980年。
- [13] 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无锡锡山彭祖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4期。
- [14] 苏州博物馆、吴江市文物陈列室:《江苏吴江广福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3期。
- [15] 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安乐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安乐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芝里遗址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19]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梅塞墩》,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1] 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
- [22]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 [23]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 [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塔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
- [2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名山后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 [2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楼家桥、盍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9] 陈明辉:《距今6000年前后环太湖流域的文化格局——兼论后冈时代》,《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
- [30] 陈明辉:《距今6000年前后环太湖流域的文化格局——兼论后冈时代》,《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
- [31]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管办、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 [32] 常州博物馆:《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 [33] 南京博物院、上海大学文物与考古研究中心、江阴博物馆:《南楼——2006年度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 [3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红卫桥遗址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3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湖州塔地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3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 [37] 方向明:《分化中的凝聚——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形态和结构的变迁》,《“城市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3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 [3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0] 普安桥中日联合考古队:《桐乡普安桥遗址早期墓葬及崧泽风格玉器》,《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酒地上遗址2013年度发掘的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

- (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九虎庙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瑞寺桥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皇坟头遗址的崧泽文化墓葬》，《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 [4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 [47]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 [48]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 [4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 [5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 [51] 栾丰实：《凌家滩与大汶口》，《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 [5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 [53] 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
- [54]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 [55] 南京博物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邱承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 [5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 [5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 [5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
- [59] 如千金角、徐步桥、雀幕桥和辉山等，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北部地区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1978—198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 [6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 [61] 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 [62] 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 [63] 徐新民：《平湖庄桥坟——良渚墓葬数量发现最多的遗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 [6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文物出版社，2014年。
- [6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
- [6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 [6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68] 赵晔：《大雄山丘陵——一个曾被忽视的文化片区》，《崧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
- [6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 [70] 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佛山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 [7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 [7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 [7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
- [7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 [75] 张弛：《良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形成过程》，《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田名利、甘恢元：《凌家滩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玉器的初步认识》，《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方向明：《良渚玉器刻纹研究之二——再论龙首纹和兽面纹》，《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